

· 自然辩证法应用 ·

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协同效应

党新益 姚 远

内容提要 运用协同学方法,分析了稳定、改革与发展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三者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并结合中国历史上和当代的改革开放实践及各种社会现象作了实例解剖。认为在把握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协同效应,使社会系统达到自组织状态时,必须形成开放系统;必须远离平衡态;必须形成非线性机制和选择适宜的相变参量。

对于稳定性问题和在改革中求得有序性发展的问题,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是令人关注的研究对象。1969年,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I. Prigogine)在经典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基础上,发现一切事物都是与外界环境不断交换物质和能量的开放系统。^[1]这种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情况下,由于非线性的复杂因素而出现涨落,当发生某些特殊事务耦合,达到一定的阈值时,会突然出现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现象,产生新的质变,从原来混沌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为在时空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一理论被称为耗散结构理论(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它为人们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复杂系统提供了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方法,并已被广泛地用于自然科学问题的研究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分析。1972年,法国数学家雷内·托姆(R. Thom)曾系统考察某种过程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跃迁,并阐述了突变理论(catastrophic theory)^[2]。这一理论已被应用到物理学、生物学,以及战争对策、语言学等领域。1977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 Hanke)以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等新兴学科为基础,正式构成协同学(synergetics)的框架。^[3]它研究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在保持与外界之间有物质流和能量流运动的情况下,并且在非线性内因作用下,自发地产生一定有序结构或功能行为的现象。它既研究这类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规律,又研究其从有序到混乱的演化规律,首次真正地将无序与有序归为一统。1978年以后,哈肯又注意到功能有序和混乱现象,认识到一个非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不仅可以从无序到有序,而且也可以从有序到混乱(指决定性方程所描述的不规则运动)。他认为,一个非平衡的开放系统,当外参量逐渐增大(减小)到一定程度时,便出现了混乱(有序)现象。这些认识使协同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理论正向宇宙系统和生物分子系统深入,并且已在生物学、社会经济、语言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稳定、改革和发展也是当今社会的主题。如何把握这三者间的关系,如何在稳定中求得改革、求得发展和在发展中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对这些问题已有不少学者从社会科学角度做了阐述。我们在本文中试图运用协同学思想,重新认识其内在机制。

稳定、改革与发展这三个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稳定的原意是稳固安定,没有变动。在化学上是指物质不易被酸、碱、强氧化剂等腐蚀,或不易受光和热的作用而改变性能。在物理学上,稳定与平衡态又常常相关。静止物体在受到微小扰动后能自动恢复至原位,即平衡状态。物体处于稳定平衡位置时,势能最小,任何微小扰动都会使它的势能增加。由于物体都有向势能较小的位置运动的趋势,故处在稳定平衡状态中的物体,在离开平衡位置后能自动回到原位置,英国科学家邦迪(H. Bodi)等进而认为宇宙在大范围内亦稳定不变,不仅物质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均匀的和多向同性的,而且

宇宙状态在时间上也是稳定不变的。

社会的稳定主要是指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稳定不是指微观层次的一潭死水、僵化或不倒翁式地离开平衡位置又自动回复到原位。这种稳定是指基本社会秩序和结构中的一种宏观有序的状态。其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有序结合；二是社会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协调发展。当这种有序结合、协调发展的状态被打破或失去平衡的时候就要发生失稳或混乱。有的学者将这种失稳归结为随机性失稳、建设性失稳、连续性失稳和破坏性失稳四个方面。^[4]这种失稳有时会导致“天下大乱”，但有时亦会成为“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系统像其他多种系统一样，具有内在的、自我运动的能力，会重新创立社会的有序结构和协调发展的状态，变“大乱”为“大治”。当然人类不可能，那怕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段也不可能生活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而如果“大乱”长久下去，必使社会陷于崩溃。

改革与变迁、改变、改进都是同意词。其原意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状态改变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状态，改革也意味着事物发生显著的变化，和原来不同，也意味着改变事物的本质。

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泛指一切社会现象和过程的根本性质的、向上的、前进的变化，特指促进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根本转变那样一种社会变迁形式。^[5]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或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还是先进的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均需通过社会改革才能得以实现。

改革在我国社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场改革的深刻性和长久性，是人们在改革之初所始料不及的。而一个长期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必然会有很多急剧的变动，必然会有不少失稳和失去平衡的不稳定现象。比如：通行已久的固定模式和旧观念受到了致命的冲击；承包、租赁、私营、雇工、竞争、招标、涨价、破产、股票、当铺等先为人吐弃，后又为人所熟悉并接受；社会新风尚、新时髦的过时和流行；解放了的思想还要再解放，更新了的观念还要再更新，等等。这些无不标志着社会的急剧变革。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变革，如何把握稳定—变革—发展的关系，对于身处改革洪流的中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会把必要的稳定视为僵化停滞，把积极的变革视为失稳和混乱。

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唯物辩证观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它把发展看成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它事物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它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它实际上认为一事物向他事物的转化是绝对的，而任何事物的常住性是相对的，整个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上升的运动。这一发展观是对客观世界的如实反映，也是唯一科学的发展观。形而上学观则错误地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它实际上否认发展的源泉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从而在实质上否认了发展。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归纳出发展这一概念的四个重要特点：第一，发展的内生性。这就是说发展主要是指产生于事物内部的变化。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即认为经济生活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而是从内部自然发生的变化，他还把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6]这就说明了发展的直接原因来自内部的变革。当然内部的变革往往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或要求并提供必要条件，而外部的压力要求及其提供的一定条件则必须通过内部的变革才能起作用。这种对外部的压力和要求作出反应的内部功能和结构，就是控制论中的“反馈结构”，有的就是协同学中的“自组织结构”。只有通过这种结构和功能的转变才会引起发展。第二，发展的新质性。这里“新”的涵义，应指“更高级”、“向上”的意思，亦即没有新质的产生是不能称其为发展的，新质与旧质相比应有显著的提高。第三，发展的不可逆性。这就是说，发展是对时间定向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发展是不可逆过程的集合”。^[7]普利高津则认为：“在所有层次上不可逆性都是有序的源泉，不可逆性是使有序从混沌中产生的机制”。^[8]实际上，没有不可逆过程，就不可能有生命，只有在失稳的状态（不可逆性产生的温床），可能发展新质。第四，发展的复杂性。这是由不可逆性直接导致的一种性质。由于不可逆性是从不稳定性中产生的，而不稳定性通常又与复杂性相关。从动力学的观点看，这种复杂系统复杂的程度，甚至与实践上根本无法重复其任何态，这种复杂化是发展的直接过程和结果，因此复杂性已成为发展的重要属性

之一。

社会总是发展的。毛泽东曾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

二

稳定、改革和发展既有各自不同的涵义，又有密切的联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稳定不是目的，而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改革是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发展的必需环节；发展则是稳定和改革的最终目的。中国制定了在社会稳定基础上，通过改革，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发展的法定目标。为此而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即为一种在稳定中求改革、在改革中求发展和通过发展实现新的稳定的典型模式。其调控机制亦表现为稳定机制、改革机制和发展机制协同动作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前提和终态都是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即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和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并通过经济和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稳定、改革和发展又有相互矛盾对立的一面。改革必然打破原有的稳定，而发展的结果也不会是原有的稳定。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彻底打破了机械决定论的稳定统治，揭示了存在不可逆过程的发展观。后来普利高津在时间不可逆性的基础上建立了耗散结构理论，并认为不可逆性是有序的源泉、相干的源泉和组织的源泉。由于不可逆性来自不稳定状态，并且只有在失稳和稳定的相变中才能萌生出新的结构。所以，具有强干扰能力的超稳定系统，是根本不可能产生新的有序结构的。

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稳定性总是受欢迎的积极因素，不稳定性总是力求避免的消极因素。但从系统演化的规律来看，任何从旧态到新态的发展，都是旧态失稳的结果。这表明旧态失稳是出现新态的必要条件，稳定性是阻碍新结构产生的消极因素，而不稳定性却成为导致自组织过程和有序演化的积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即失稳现象。当然这种失稳有可控、不可控或良性、恶性之分，也就是说并非每一种失稳都有利于新体制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我国目前所进行的改革，有力地冲击了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有力地打破了旧的僵化状态，激发了社会内部各种因素自身的活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社会变动急剧、利益矛盾尖锐、失范行为增多和双重控制模式所带来的摩擦与冲突。由于改革必须使社会系统处于开放状态和远离平衡态，因此不稳定因素与改革和发展是始终如影随形的，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去消除或适当调控和诱导。从协同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系统内部都始终存在着导致宏观结构偏离原有稳定性的各种自发随机涨落，并由此而形成失稳，而这种自发涨落恰恰是各种新结构形成的触发器。从此角度看，失稳是产生新的有序运动的前提，不仅不可怕，它还是一个吉祥的征兆，是黎明前的黑夜。认识稳定、改革与发展间对立、排斥的一面，是很重要的。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但却不是改革和发展的伴生物，它不会伴随着改革和发展必然到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欧和前苏联似乎由于推进政治改革和发展而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失稳，并且这种失稳亦未得到有效的控制。但这种表象并不反映本质。这里关键是在把握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上的失控所致，这些国家在缺乏稳定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相信只要模仿西方的民主政治，就会发展并同时达到新的稳定。其实，这些国家在实现民主方面恰恰是最没有基础、最没有准备和最没有训练的。这就使得这种政治改革和发展成为脱离稳定、超越现实的盲目动作，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不稳定。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把握振荡幅度和把握从振荡状态转入稳定状态的速度，以及把握系统目标值与允许值之间误差的准确度等问题。

我国也曾出现过把握稳定、改革和发展这一关系失度，而出现政策摇摆、矫枉过正的偏差。如1978年底1988年初提出的稳定物价和“坚决把物价上涨的势头压下去”的方针；1988年春夏提出的放开物价和致使物价急剧上涨；1988年秋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和全力扭转通货膨胀。这种失度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并形成三次大的抢购风潮。到1988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之后，提出“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方便改革和发展的振荡度明显减弱，社会渐趋稳定。这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开始加快改革步伐和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新举措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前几年治

理整顿的成果,就不会形成新的社会稳定秩序,也不可能在这种稳定条件下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事实上,任何意义的稳定性只能是相对的,是终究要被变革的,只有破除旧有的稳定才能发展新稳定。稳定—失稳—改革—发展—稳定,这是一个连续的、交替的发生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使系统不断更新,逐步地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并且由于这一过程发展的永恒性和不可逆性,会使系统越来越复杂和越来越高级。也就是说,复杂化和高级化是发展的本质。只有正确把握稳定、改革、发展的这种本质关系,才能够掌握系统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使系统达到自组织状态。

我国的改革开放,向政治体制提出了双重目标:一是政治要发展,二是政治要稳定。这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政治的发展和稳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政治稳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是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极高的社会中,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也就说不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国家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这一观点已被中外历史发展的事实和现实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它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成为从中国特殊国情中总结出的一种规律。

但是,稳定绝不是原地不动。稳定必须与改革和发展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既无脱离稳定的有效改革和持续发展,亦无脱离改革和发展的真正稳定。改革和发展是实现稳定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失稳是获得新的更高级的稳定的前提。有发展,系统才能保持活力,提高能力和效力,并完善自身,从而使系统实现真正的、动态的和良性的稳定。就中国的稳定而言,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政治稳定而不是虚伪的政治稳定;动态的政治稳定而不是僵化凝滞的政治稳定。否则,这种政治稳定非但不能促进改革和发展,反而会压抑和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导致新的不稳定。

三

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协同效应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亦即稳定和发展通过改革这一相变(质变)过程,在社会系统中发生了质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空间有序的时间结构和功能结构,即自组织。

在社会发展中,如何把握协同效应,达到自组织状态呢?我们认为主要应满足以下条件,或者说应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必须形成开放系统。

开放性是系统发生有序演化的必要条件。这主要因为:一是一切生命系统的有序演化都以系统同环境不断交换物质和能量为先决条件;二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断言任何与环境没有物质能量交换的系统必然是走向最无序的状态。从数学上可反证如下:设系统A中存在减熵的有序演化过程。如果这个系统是不开放的,系统与环境之间没有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那么该系统只可能发生趋向于最大熵值的平衡的无序演化。这同题设自相矛盾。因此,系统A必定是开放的,必须是开放的。

一切有机体,生物群落都具有开放性。一切社会组织也都是开放系统。任何开放系统的外部特征是存在输入和输出,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其内部特征是不断破坏自身旧的物质组分,不断组建新的物质组分。这是对立统一、互为条件的一种关系。正由于内部不断进行组分的建构与破坏,所以必须与环境不断交换物质;由于物质的输入和输出不断进行,系统内部才可能有组分的不断破坏与组建。

10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史证明:不面向世界,不向世界开放,不与世界市场进行广泛的物质、能量的交换,就必然闭关锁国,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就必然形成一种难以发展变化的封闭系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汉、唐、宋几个巅峰时期,之所以使黄河流域的长安等古都一时成为世界向往的文化中心,这与汉唐间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汉唐长安文化中心在宋代东移的原因,除政治军事等因素外,陆上丝绸之路的艰险,小型交换和逐渐萎缩,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宽阔、大型交换和逐渐兴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近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更说明一个处于开放下的社会系统的巨大生命力。

第二,必须远离平衡态。

平衡的、稳定的状态不可能是第二类有序结构,特别是有机体的有序性之源。在平衡、稳定过程中进行的

结构演变,要么向最无序状态变化(孤立系统),要么向有序结构变化(封闭系统)。而非平衡态是系统离开平衡态后所处的状态,依其距离平衡态的“远近”,或者说非平衡性程度的大小,可分为近平衡态和远平衡态。只有非平衡态才可能是新的有序结构之源,并且,只有远离平衡态才能形成有序之源。近平衡态是系统在弱小的外部约束下以连续光滑的方式从平衡态过渡而来的,它不可能改变系统原来的空间均匀性,因此不是有序之源。

这就是说,在平衡或者稳定状态是难以求得系统发展的,必须经过变革,即通过外部对系统施加一种非平衡约束来实现。这种约束并非瞬时存在的扰动,或者一种权宜之计,应该是通过外部环境系统施加的一种持续、稳定而长久的作用力。在此种意义上,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中心控制的近平衡态。其系统稳定性有确定的规律,内外干扰或涨落总是被系统自身阻尼掉,这是计划经济系统在平衡态和近平衡态不可能形成有序结构的根源。这一状态下的政府职能对经济发展来说主要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上。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企业经营者无压力、无动力,职工积极性受到压抑,经营者逐级听命于上级系统的决策。亏,可由政府补;盈,可受到褒奖和升职。经营者是投上级所好,而不是应社会所需。久而久之,“搞平衡”成为决策者惯用的一种领导艺术。各个经营单位也将维持平衡作为一种追求目标。这样的系统显然不是一种良性运行。实际上,按协同学的原理,正是在动力学的线性失稳点附近,存在少数几个不稳定模(序参量)和大量稳定模,这些不稳定模以一种特定方式支配稳定模,同时又通过自组织确保了宏观有序结构。

减少政府的干预,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下放权力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其目的正是要形成一种远离平衡态。近年来,边疆地区、沿海地区发展较快的原因之一,不能不说与远离中心控制和中央赋予优惠的自主经营权力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实我们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也可佐证这种“远离平衡”和“非平衡约束”的积极意义。

第三,必须形成非线性机制。

如同生命系统一样,社会系统是一种非线性很强烈的系统。如果说非平衡约束是系统有序化的外部源泉,那么非线性机制就是系统变化的内部有序之源。在弱小约束下,线性特性在系统中起主导作用,非线性的影响受到抑制。随着约束增大,离开平衡态的距离相应增大,线性影响逐步减弱,非线性影响逐步增大,直到取得支配地位。由此可见,在平衡态附近线性规律起支配作用,在远离平衡态附近非线性机制起支配作用。这一点在数学上已被严格证明。^[10]

由于非线性是指运动规律不是简单地按比例增加(或减少),故会使人们在直觉上感觉不很“合理”,甚至会感到“混乱”和“不可思议”。“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有悖于“共同富裕”观念的非线性机制。“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也正是非线性理论的创造性再现。解放思想,“换脑子”,更新观念,都是要跳出传统的线性域而接受非线性机制的作用。正由于非线性是系统发展的内部有序之源,并且可以在这种相互作用下产生出系统的整体新质,所以我们对一些有悖于传统观念的非线性概念,千万不能畏惧或者动摇了前进的决心。

第四,选择适宜的相变参量。

即找出“带头”(处于支配地位)的变量或模式。这正是协同学支配原理的巨大威力,实际上是把数学上难于求解,甚至无法求解的一组非线性方程简化为少数几个甚至一个序参量方程。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是要使社会的宏观性质发生一次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转变(相变),从而实现自组织过程。

从协同学的观点来看,平衡相变和非平衡相变,都是一种阈值行为。相变过程是通过改变外部参量来控制的,只有当控制参量达到一定阈值时,才能发生相变。并且,相变都表现为一种突变行为。哈肯以序参量代替熵概念作为处理自组织问题的一般判据,并认为不论什么系统(包括社会系统),如果某个参量在系统演化中从无到有地变化,并能指示新结构形成,它就是序参量。西方曾在充分就业与非充分就业之间的相变研究方面,得到了颇有价值的新认识。

协同学处理问题的基本思想是:把一个高维的非线性问题归结为用一组维数很低的非线性方程(即序参量方程)来描述。显而易见,影响我国改革的因素是很多的,应用协同学处理问题的基本思想,来分析我们的改革进程。目前中国改革选择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从多个系统中选出的一个起关键性作用的系统,并将通过控制和调节这一系统,使改革的大系统达到自组织状态(有序运动)。货币投放、利率调

整、市场的建立、价格的调整、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等,都可视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宏观参量。通过控制这种“序参量”,人们已看到了中国改革的新的有序结构的曙光。

参 考 文 献

1. I. Prigogine, Structure Dissipation and Life, Theoretical Physics and Biology, Versailles, 1967; North Holland Publ. C., Amsterdam, 1969.
2. R. Thom, Stabilité Structurale et Morphogenèse, Benjamin, Reading, Mass, 1972.
3. H. Haken, 协同学讲座, 宁存政 李应刚译,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4. 熊继宁 徐伟华:“论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社会失稳”,《中国政治》,1992年第4期,第19~20页。
5. 李星万 叶丽荣:《社会学基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1页。
6.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 易家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
7. 李相银:“发展机制”,《系统工程》,1992年第10期第19~20页。
8. 湛垦华 沈小峰:《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技出版社,1982年。
9. 毛泽东,转引自:“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10. 党新益 许立俭:“多项式微分方程描述的生态系统在无穷远处的性质”,《生物数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31~37页。

作者简介:党新益,男,1939年生,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姚 远,男,1955年生,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管理科学与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培富

· 学术动态 ·

北京天地生人学术讲座

第 52 讲 内皇阿密与中西医学的统一

——“科学传统的光辉与暗区”之八

主讲人:寇长江(香港东方古代科学研究会顾问)

(1)内皇阿密的基本理论和实践

(2)中西医学统一的难点

(3)中西医学统一的可能性和方法论

特约主持人:胡国臣(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时间:1994年3月17日9:00—11:30

地点: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一楼(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

内皇阿密是佛教医学的最高层次和核心。寇先生精通佛医,更是内皇阿密的主要传人,长期以来寇先生在内外皇阿密的理论和实践中,大力探索中西医学的统一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现特邀请寇先生介绍自己的见解,欢迎关心中西医结合的各位专家学者参加。

讲座组织人:王树芬 傅芳 孟庆云 李林